

红旗



一九五九年

20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二十期 ★

目 录

伟大的十年.....周恩来 (1)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李井泉 (16)

为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薄一波 (24)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张鼎丞 (31)

换了人间.....马锡五 (38)

各地党委刊物论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大放光辉的十年.....“团结”社论 (45)

坚持政治挂帅的方针.....陈丕显 (47)



伟大的十年

周恩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发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人间地狱的奴隶一变而为自己命运的大无畏的主人。全国人民以欢乐的心情回顾着已经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同时充满信心地瞻望着将来。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十年来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人们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得到什么主要的教训。

尽人皆知，十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二十六位；发电量占第二十五位；煤产量高一些，占第九位；就是比较发达的棉纺业的产品——棉纱的产量，也只占第五位。全国产业工人只有三百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小麦、大米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根据海关统计，一九三三年曾进口粮食六十亿斤，一九四六年曾进口棉花六百九十万担。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

当时中国的情况如此悲惨，以至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间向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行政会议宣读的声明中，不得不承认美国不断倾注的大量援助，无法挽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并且断定“中国缺乏原料和工业资源”，在最近的将来难于成为第一流强国。一九四九年八月间，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在他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嘲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种种诺言”，预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任何政府也不会得到成功。

但是，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开幕典礼



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創伤，建設起一个嶄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誰的預言应驗了呢？

按照調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計劃的預計完成数（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这个計劃的大部分指标都将超額完成），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点三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将增长十点七倍。鋼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长七十五倍；煤产量将达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增长九倍多；发电量将达到三百九十亿度，比一九四九年的四十三点一亿度增长八倍多；棉紗产量将达到八百二十万件，比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八十万件增长三点五倍。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的鋼、煤、发电量和棉紗已經分別跃居世界的第七位、第三位、第十一位和第十二位。旧中国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現代工业建設，到一九四九年，工业固定資產还不到一百三十亿元；而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資產，却达到四百五十亿元左右。旧中国发展电业近七十年，到一九四九年，发电能力还不到一百九十万瓩；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就等于这个数字的三倍以上。旧中国建設鋼鐵工业近六十年，到一九四九年，炼鋼能力还不到一百万吨；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炼鋼能力，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

帝国主义分子譏笑我們調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計劃是“大跃进”。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經過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大跃进。这种跃进的速度，是帝国主义国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就拿我們的发展速度跟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比較一下吧。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中，我国工业生产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而美国是百分之三点七，英国是百分之二点九。在我国工业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美国工业比上年降低了百分之六点五，英国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九。如果我們的速度叫做“大跃进”，請問他們的速度該叫做什么呢？

资产阶级的評論家們为了贬低我們大跃进的伟大意义，还提出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謬論。他們說，中国发展速度快，只不过是因中国原来的水平太低罢了。但是，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我們的发展速度不仅表現在每年平均增长的百分比上，而且表現在每年增长的绝对数量上。我国的鋼产量，一九四九年是十五万八千吨，一九五九年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即十年間增长了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二千吨，大致相当于美国历史上从一八七二年到一九〇一年的二十九年間所增长的数量，或者相当于英国历史上从一八六九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六



十七年間所增长的数量。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当时不能用中国现在这样跃进的速度发展呢？资产阶级的诡辩家，你们还拿得出什么论据来为资本主义国家爬行的发展速度解嘲呢？

由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如此迅速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和生产资料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在一九四九年分别为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到一九五八年已经分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和百分之五十七点三。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自己生产约五百种钢和六千种钢材，多种新式重型机床，二千五百吨的锻造水压机，采煤和炼焦的成套设备，一千五百多立方米的大型高炉设备，喷气飞机，各种汽车，拖拉机，载重量五千吨的海轮，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力发电设备和五万瓩的火力发电设备，全套纺织、造纸和制糖的设备，等等。工业的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钢铁工业原来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东北，现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建设了大小多少不等的钢铁工业基地。发电厂原来只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现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以至若干农村都有了不同规模的发电站。纺织工业原来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无锡等几个城市，现在全国多数省份都已经新建了许多新型的纺织厂。从前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许多荒僻地区和人口很少的城市，现在已经建立起大规模的工业基地。这一切事实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世界上无论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大国。

我们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发展农业。十年中间，我国农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半。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五千五百亿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也将增加一倍半；棉花产量将达到四千六百二十万担，比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八十九万担将增加四点二倍。我国粮食总产量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占世界第一位，棉花总产量去年占世界第二位。当然，按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农业水平，跟工业水平一样，还是很低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的速度。虽然我国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都还非常少，而美国比我国多出不知多少倍，但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我国棉花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二，美国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

农村中的基本建设迅速地发展了。解放初期，全国灌溉面积只有二亿四千万亩；由于过去十年来兴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和水库工程，灌溉面积已经达到十亿亩以上。农村中还兴建了大量的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的小工厂。跟农业有密切关系的林业、牧业、副业、渔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全国造林面积累计达到五亿亩，大家畜从六千万头增加到八千五百万头，猪从五千七百万头增加到一亿六千万头。

适应着工农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九年我国铁路的通车里程还不到二万二千公里，一九五八年已经增加到三万一千多公里。现在，全国各省和自治区，



除了西藏以外，都有了铁路。在同一期间，公路从八万公里增加到四十万公里。一九五〇年我国的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只有一万一千多公里，一九五八年已经增加到三万三千公里。货物周转量，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这九年间，铁路增加九倍多，汽车增加二十六倍多，轮驳船增加九倍多。木帆船、兽力车等非机械化运输也有显著的发展。九年间完成了许多工程巨大的建设，如成渝铁路、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天兰铁路、包兰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康藏公路、新藏公路等；正在建设中的，有兰新铁路、川黔铁路、内昆铁路、湘黔铁路等和长江黄河上的几座大桥。由于大量的简易公路的修建，一九五八年全国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县城能通汽车。邮电和广播事业也发展得很快。全国邮电机构从一九四九年的二万多处，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六万多处。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有百分之九十八通了电话。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商品零售额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二点二倍。各种主要消费品的销售量同一九五〇年比较，粮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食用植物油增长百分之九十七，食盐增长百分之九十四，食糖增长三倍，水产品增长二点四倍，棉布增长一点二倍，机制纸增长二点七倍。由于消费品供应的不断增长，由于投机商的彻底消灭，由于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银行信贷的平衡，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国的物价一直是稳定的，仅仅对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作了若干有计划的调整。

十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巨大的变化。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海关管理权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在进出口贸易中，长期入超的局面也开始扭转过来了。一九五八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二点一倍，其中进口增长一点九倍，出口增长二点三倍，进出口基本平衡。进口的物资跟解放前以消费资料为主的状况相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机器设备、原料材料等各项生产资料，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出口的物资主要还是农产品，但是工业品出口所占的比重，也已经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九点三，逐步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料，“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由十一万七千人增加到六十六万人，增长了四点七倍；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由二十二万九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七万人，增长了五点四倍；普通中学学生由一百零四万人增加到八百五十二万人，增长了七点二倍；小学生由二千四百四十万人增加到八千六百万人，增长了二点五倍。一九五八年许多县市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全国学龄儿童百分之八十五已经入学。在职工、农民和城市居民中的扫盲运动和业余文化学习，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级学校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在教育战线上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的革命。



科学研究工作在十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全国已有专门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八百四十多个，研究人员三万二千余人，比解放时分别增加了约二十倍和五十倍。

在同一期间，出版事业，电影、戏剧和其他艺术事业，都有了巨大的增长。

十年来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也很快。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医院和疗养院五千六百多所，病床四十四万张，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倍多。此外还新建了九十多张简易病床，分布在小城市和乡村。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卫生技术人员达到二百一十六万人，比一九五〇年的七十八万人增加了一点八倍。

随着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这个事实，从上面所说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一九四九年全国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共有职工八百万人，到一九五八年底已经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万人，即增加了四点七倍；其中产业工人由三百万人增加到二千五百六十万，即增加了七倍半。不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已经完全消灭，而且就业面已经显著扩大，全国城镇人口中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两个人就业。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农民个人收入增加了将近一倍。全国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从一九四九年的六十万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三百七十八万人。全国农民在参加了人民公社以后，绝大多数缺乏劳动力的人口享受着免费供给粮食或伙食的待遇；从前愁吃愁喝的困难生活，快要变成历史的回忆了。

国家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给予极大的注意。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超过七十亿元。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建设了新的工业基地，修通了铁路和公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五八年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粮食产量和牲畜也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销售额，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四点七倍，收购额增加了五点二倍。少数民族学生数相当于解放前的九倍以上。医院和疗养院已经达到七百七十五个，共有床位三万四千多；此外还有医疗保健所(站)一万四千多个。各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人口不断减少的倾向已经完全扭转了过来，出现了经济文化生活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西藏地区过去因为民主改革长期受到阻挠，情况比较特殊；但是在叛乱平定以后，人民也积极地开始了向新生活的进军，幸福和进步的西藏不要很久就会建设起来。

人们也知道，十年前的中国，国家的政治状况是极端黑暗和反动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资本家、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处在绝对无权的奴隶般的地位。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民，除了遭受帝国主义者和本民



族的贵族、地主、奴隶主的压迫以外，还遭到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国家长时期内是分裂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各派军阀的混战和反动统治者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几十年间连绵不断，使人民饱受战祸。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盗匪、流氓、会道门到处猖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十年来这一切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压在人民头上的贪污腐化的恶政府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世代所梦想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勤劳的政府。人民无权的状况已经永远结束；极其广大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最广阔的民主。民族被压迫的现象消灭了，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友爱互助的大家庭。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巩固的统一。盗匪、流氓、会道门以及娼妓、乞丐、赌场和毒品，一概清除了，社会秩序极为安定。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干劲冲天地建设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人们也熟知十年前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在怎样悲惨的地位。多年来我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把我国看作是一块肥肉，谁都在啄食它。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企图瓜分它；日本侵略者要求独吞它，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已经独吞了它的几乎一半；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一心一意地要继承日本侵略者的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但在世界政治生活中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而且几乎被剥夺了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权利。

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独立自由的人民新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宣告的那样：“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的衰弱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强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无权地位也正向它的反面起变化。在已经解放了的全部土地上，它已经充分地行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它也必须有权参与一切关系到它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企图把侵略的火焰从朝鲜扩大到中国大陆，妄想用武力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消灭掉。中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粉碎了这个侵略阴谋。台湾虽然至今还为美帝国主义所侵占，但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美帝国主义至今还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孤立和排斥新中国，但是这个企图也一天一天失败了。现在，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国家，已经有三十三个；同我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九十三个；建立文化联系和进行友好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一百零四个。我们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国根据“五项原则”和万隆宣言，同亚洲、非洲许多民族主义国



家建立了和发展了友好合作的关系，组成了广大的和平地区。我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作为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对于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作了并且正在作着应有的贡献。

怎样来解释这一切飞跃的发展呢？它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人民中国的飞跃发展，基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成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人民如果不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推翻，当然就只能无限期地沉沦在贫穷和落后中间。但是如果在推翻这三座大山之后，不立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象有些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样，那么，也决不可能有十年来的飞跃发展，更不用说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了。

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文化落后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反动的论点早已被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驳得体无完肤了。至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如此顺利，那么，应该指出，这里有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条件。在客观上，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民群众有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传统；中国革命发生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能够利用苏联的经验 and 苏联的援助，能够利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在主观上，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由于这种领导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善于把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的建设经验和中国的建设经验结合起来，善于按照中国的条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善于按照中国的条件，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把党的领导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群众运动、千百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想就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特别是关于不断革命的方法和群众路线的方法，稍微多说几句。

中国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

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是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时也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虽然吸收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这个时候，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内的基本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了。革命不应该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停顿下来，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



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間，中国人民还需要用很大的努力来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所留下的任务，其中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但是，人民大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没收官僚资本，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这样，就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确立自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针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党在一九五二年领导了“三反”（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群众斗争，给了资产阶级的进攻以粉碎性的打击，并且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着服从社会主义经济领导、接受工人阶级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土地改革后，党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大力鼓励和促进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的方向，并且不断地同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驳斥了党内外一部分人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的四大自由”等资产阶级观点，及时地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迅速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且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由于党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使革命运动不间断地步步前进，终于在一九五五年秋冬出现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这一高潮又推动了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也推动了个体手工业者组成手工业合作社的高潮。这样，就在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接着不久，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要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必须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能够进一步地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同时，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任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结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中间彻底地孤立了，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得到了正确的处理，因而无论国家机关和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跟工农群众的关系；工农群众内部的相互关系，或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都进一步地改善了。由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胜利，全国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建国以来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运动，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



期的头两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收获，这就是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本来是很高的，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五年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八，而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一九五九年是计划数——下同）两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十五。钢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一·七，近两年是百分之五十；煤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十四·四，近两年是百分之六十。在农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五，而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两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七。粮食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三·七，近两年是百分之二十二；棉花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四·七，近两年是百分之十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工业建设单位接近一万个，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建成了四万一千多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第一个五年全部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为五百三十七个，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达到七百个。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我国经济能够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高速度地发展的原因何在呢？这不但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正在进行，还没有完成，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还没有充分建立，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地存在着，而这一切都限制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第一个五年的后半期，即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连续不停顿地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我们党又根据这种有利形势，及时地提出了和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由于这一切，我国人民才能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就开辟一个大跃进的新局面，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大提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适应于这种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建立起来以后，还是处在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随之，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随时需要革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不断地产生而又克服，克服而又产生，这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法的过程。正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的上层建筑能够按照需要而不断地调整和革新，所以才能够保证生产力的不断高涨。在一九五八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中出现的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就是这个真理的一个新的证明。在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巨大发展的需要面前，原来



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觉得不能适应了。全国的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社，平均每社约一百六十户，在一九五八年夏秋之间合并改组成为二万六千多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约四千六百多户，以后经过整顿，又改组成为二万四千多个公社，每社平均五千多户，也就是说，规模相当于原来农业社的三十多倍。公社由于规模大，力量大，就不但可以迅速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建设和建设，而且可以统一领导农村中的工农商学兵各方面工作，实现经济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的合一。农村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主要的生产资料仍然属于大致相当于原来农业社的生产队所有，但是公社一级已经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并且每年可以从各生产队提取相当的积累，在社员收入的分配制度中也包含了一定范围的供给制成分。在人民公社化胜利了的一九五八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林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点二，渔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牧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五点二。全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和造林的面积，都远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的总和。人民公社的工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最近整社以后的统计，全国人民公社约有七十万个工业单位，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两倍。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的积累达到一百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多。全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左右。这一切事实，说明人民公社的巨大的优越性是不可怀疑的，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们的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一亿一千多万个体农户变为二万四千多个公社，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个多么光耀的胜利！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又是按照一定的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过程。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实际上，我们不但认真地区别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认真地区别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的原则，反对超越必经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且在每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还按照具体情况，认真地区别若干相对地属于量变性质的较小的发展阶段（从一个较小的发展阶段到另一个较小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种较小的质变），采取适当的步骤，以适应生产关系的逐步演变和群众觉悟的逐步成熟的需要。广大农民能够自觉地由个体经济进到人民公社，是因为他们经过了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一系列阶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也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工业方面的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商业方面的经销代销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阶梯。同样，政治战线、思



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适应着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高一陣、低一陣地波浪式地前进和逐步深入的。党的这种正确的领导，既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经常饱满，不至因为革命发展的中途停顿而冷却，又能使群众的觉悟步步提高，不至对于革命的发展缺乏准备。因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号召，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也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虽然很迅速，工农业生产却始终是在继续高涨着，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破坏。

党在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方面得到的成功，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因为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是坚持这种工作方法而取得胜利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把这种工作方法有系统地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而展开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完全可以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会有去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的重视。总路线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号召六亿五千万人提高自己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把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动员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要进行得多又快又好又省：解决这个复杂的、困难的任务是可能的吗？帝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告诉我们说：不可能。他们断言多快和好省二者不可得兼，要求兼而有之就无异于“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附和他们说，不可能。但是我们坚决地回答说，可能。因为我们所依靠的，首先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当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极其伟大的创造的力量，如前所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但是，就在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不注意用适当的方法去调动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仍然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党的总路线根据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客观法则，正确地安排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规定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



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实行这样的“两条腿走路”方针，不但是为了保持各个经济部门间的必要的平衡，而且首先是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开辟最广大的阵地，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建設队伍能够展开，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充分地使用到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中来，从而使多快好省要求的实现得到保证。中小型的、土法的或者半土半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不及大型的、洋法生产的工业，但是比起过去的简单的手工劳动来，劳动生产率却显然是大大提高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发展大型的、洋法生产的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的、土法的或者半土半洋的工业，并不是浪费了人力，而正是合理地利用了人力；并不是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而正是大大加速了工业化的速度。同时，无论在什么经济部门和什么企业内，都实行了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工业化的任务，就成为最广大群众所直接参加和积极参加的事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民办工业。

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之所以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主动积极作用。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特别反对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和洋土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说那样作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其结果是“只能多快，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工作中的个别的、暂时的缺点，不加分析，而且任意夸大，来达到否认大跃进、反对总路线的目的。对于他们的这一切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和污蔑群众的论调，事实是最好的反驳。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快，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大家知道，在大跃进中，由于劳动人民鼓足干劲，许多重大建设工程提前完工和投入生产。例如武汉钢铁公司日产二千多吨铁的现代化的大高炉，原计划二年建成，只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就投入生产。鞍山钢铁公司日产一千多吨钢的现代化的大平炉，原计划十个多月建成，只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投入生产。过去建设的官厅水库，土石方工程量一百四十五万立方米，设计库容二十二亿七千万立方米，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建成。最近新建的密云水库，土石方工程量二千零五十六万立方米，设计库容四十一亿立方米，只花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千四百六十七万立方米，并且发挥了拦洪作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这样大的建筑，只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而所有这些建设的投资，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同类工程少得多。以钢铁和煤炭工业建设为例：过去建设大型高炉每立方米容积的平均投资为二万五千元，现在只需要一万四千元到一万八千元，降低了百分之二



十八到四十四；过去建设大型煤矿每吨生产能力的平均投资为三十三元，现在只需要二十二元，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谁能够说，这些建设只有多快，没有好省吗？在生产方面，同样既实现了多快，又实现了好省。一九五八年不但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了，而且由于充分地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试制成功了大量的新产品，其种数差不多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的总和；这些新产品中有不少是高级的、精密的、大型的、复杂的、尖端的，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水平的。同样，由于充分地发动了群众的集体智慧，我国各种生产设备的利用系数在两年来不断提高；其中高炉、平炉、机车等的利用系数，都已经达到世界上的最高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各工业部五年合计总共降低成本百分之二十九，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五。请问那些认为有了多快，就不能有好省，在工业中展开了群众运动，就会乱成一团、得不偿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你们怎样来解释这一切呢？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质量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我们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质量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平。现在小高炉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继续发挥。估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小高炉产铁总量大约可以达到五千五百万吨到六千万吨。今年中小煤矿所生产的煤，在煤的总产量中将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离开了我们所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离开了这个在工业化事业中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就没有了大跃进，没有了总路线。

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一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煤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十八。一月到九月合计，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五，钢产量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煤产量增长百分之七十二。全国的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九。商品收购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六。九月底商品



庫存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市場供应情况良好。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許多地区的灾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

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充分証明：第一，多快好省的要求是完全现实的，它已經开始实现，而且以后随着經驗的丰富，还将繼續更完滿、更有效地实现；第二，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須贯彻执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使英雄的广大群众都有用武之地；第三，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須在每个企业中有领导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揚广大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創造性，领导他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針，和在每个企业內开展群众运动，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运用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的两个方面。

由此可見，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运用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这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常迅速、非常順利的发展，这就保证了我国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的飞跃式的发展。

經過两年来的大跃进，第二个五年計劃建議原定的一九六二年的主要指标，可以在今年超額完成。这样我們就有可能在今后三年使工农业生产获得更大的发展，并且可以騰出手来加强某些薄弱环节。完全可以預料，第二个五年計劃时期必然是一个大跃进的五年。既然在过去十年，我国的国民經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末今后十年必然会有更大的变化。那时候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絕大部分都将超过英国。

当然，我們的跃进还只是在开始。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說来，我們的工作还很不够，我們的經驗也还很不够。我們必須繼續刻苦地努力工作和努力学习，繼續在我們自己的工作中認真地总结和积累經驗，并且繼續認真地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經驗。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已經奠定了飞跃发展的基础，并且找到了繼續跃进的道路。無論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怎样污蔑我們，也無論国内的資产階級右派以至我們党內的某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反对我們，都决不可能破坏我国人民所已經奠定的基础，或者改变我国人民所已經选择的道路。人民描写自己的人民公社是“雷打不散”。这不但是广大群众对于我們的人民公社运动的結論，这也是广大群众对于我們的总路綫、大跃进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結論，这也是广大群众对于我們党和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团結的結論。

国际的条件同国内的条件一样有利于我們的跃进。首先，由于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强大和团結，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斗争的发展，和平和进步的力量正在愈来愈显著地超过战争和反动的力量。这个事实，在赫魯晓夫同志訪問美国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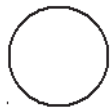
功中得到了新的、显著的表现。其次，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首先是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争取独立民主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我国人民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特别要感谢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了一百六十六个项目，去年和今年又新订了援助我国建设一百二十五个项目的协议，并且在十年中先后派遣经济、文教专家一万零八百多人来华工作。同时，也要感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了六十八个项目，以后又新订了援助我国建设四十多个项目的协议，并且先后派遣一千五百多个专家来华工作。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同兄弟国家人民的巨大援助分不开的，他们的情感和友谊是我国人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我们应该永远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兄弟般的合作。

为了在第二个十年内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我们必须努力加强目前工业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并且必须继续大力加强农业，以便在保证粮食作物继续增长的同时，使轻工业获得充分的原料来源。很明显，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后，我们的经济水平仍然不能算高。我们还需要以西方资产阶级所不敢设想的速度，继续前进到更远的目标。我国人民已经抱定坚定的决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困难无疑总是有的，而且不少，但是这永远不会把我们吓倒。回顾过去的十年的成就，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我们就有了充分的信念：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只要我们坚决地依靠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这样两个伟大的力量，在新的十年内，我们一定能够更顺利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取得更光辉的胜利。

让我们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为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而继续鼓足干劲，奋勇前进吧！

（原载195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人民公社是我国 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李井泉

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誕生已經一年了。人民公社是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经过整顿，它迅速地走上了巩固而又健康的发展道路，为发展农业、为支援工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正当举国人民为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国内外敌人却对它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我们队伍中也出现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国内外敌人的叫嚣遥相呼应，肆意非难人民公社，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少数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还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该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搞坏了”，“公共食堂是强迫命令搞起来的”，等等。他们否认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必然产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否认人民公社所采取的若干新制度，是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态的反映；否认人民公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已经起的和将要起的伟大作用。

国内外敌人之所以诬蔑和攻击人民公社，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因为人民公社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了国内外敌人对人民公社恶毒攻击的应声虫，百般地非难人民公社，那种非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坚决反对的；就是那些对个别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是不赞成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①有矛盾就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需要解决。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解决了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又出现了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比较小、经营范围比较狭不能适应生产力大发展要求的矛盾。人民公社的产生就是为着解决这个矛盾。

由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表明我们的革命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同时又是不停顿的。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和不断革命论的原理。我们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的指导下，使革命由一个胜利转变到另一个胜利。人民公社化是我们一个突出的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同时又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是百战百胜的。

我们回顾一下解放以来我国农村一系列变化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

解放初期，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摧毁了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这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的第一步。接着，在党的领导下，又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原来处于极端贫困的、具有强烈革命要求的中国农民抛弃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最初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建立了集体劳动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织；然后又使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再进一步地实现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建立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系列的生产关系的变化，都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而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已为农业生产不断增产的事实所证实。从四川省历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情况来看：一九五四年农村互助组织大量发展以后，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百分之六点六；一九五五年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后，一九五六年比互助组时的一九五四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一九五六年冬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后，一九五七年由于反“冒进”的影响，增产的幅度不大，但是，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生产有特大跃进，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

农业合作化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途径的第二步。

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这个运动而来的，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热情的普遍高涨，他们迫切要求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要求迅速地摆脱我国农村贫穷和落后的状况。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鼓舞下，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改良土壤和植树造林运动。在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后，农村的生产建设高潮以更广大的规模向前



发展。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展了以改革农具和制造土化肥为中心的大办地方工业的运动；在全面总结我国农业生产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促进了农业的技术革新。生产的大发展在人们面前预示着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耕作园田化的农村美好前景，许多地方拟定了实现这种美好前景的雄伟规划。所有这些，都证明在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空前大跃进的新形势下，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迫切的要求。

原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开展生产运动和实现各种生产建设规划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更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劳动力。据当时的典型调查，单是水利建设、深耕土地和采取合理密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就需要增加一倍左右的劳动力；为了不误种植季节，为了战胜灾害，进行增种补种，为了发展林业、畜牧业和副业等多种经营，以及为了举办必需的地方工业等，所需要的劳动力则更多。其次，是生产的发展需要更合理地调剂和使用生产资料。比如，大搞水利建设需要进一步地调剂水源；为了按照地形、气候条件、土质情况进行划片种植与专业经营，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因地制宜地调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三，为了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八字宪法”，需要扩大经营范围，举办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举办足以培养农村建设人材的学校等。第四，为了便于集体耕作和减轻劳动强度，还必须逐步改善极其分散的居住条件，修建便于运输的交通道路，以及举办必要的社会福利事业等。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当时只有几十户或者一百多户的、单纯经营农业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能解决的。随着生产的发展，政权对生产的领导需要进一步加强。而当时的基层政权是以乡为单位，它虽然也领导了工农商学兵几方面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政社合一的统一领导，要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上述各项巨大的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反映了当时基层的生产单位和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这是广大干部和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回答的。因此，在人民公社还没有出现以前，各地群众就已经仿照过去创办几百户、千多户的大社的经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变更。当时四川就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为大社，有的已合并为一乡一社的大社，并且扩大了经营范围，开始发展自己的为农业服务的小规模工业；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改进了劳动组织，加强了社内外的劳动协作和生产联合，这种协作和联合有时不仅超过了乡界，而且超出了县界。大约三分之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组织。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开始将猪折价入社，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大部分自留地也归社统一经营。广大群众坚信只有更大的集体才能更有力地战胜贫困，因此，合并小社，创办大社，已是势在必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根据当时群众的要求，及时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中



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總結和提高了群众的創造，发展了“具有很大灵活性”的人民公社这一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重要变革，这就是：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使原有单一的农业生产組織，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相結合、农林牧副漁綜合經營的社会基层組織；使原来的农村基层政权机构和基层生产单位統一起来了。这种变革又立即反过来推动着生产力更大的跃进。这一点，同样为人民公社建立一年来在发展生产方面所取得的丰功伟績所証明。四川省人民公社建立以来，不仅在农业生产和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全省的农业生产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跃进；而且，去冬还抽調了几百万劳动力大办鋼鐵，有力地促进了鋼鐵工业的大跃进。

很显然，右傾机会主义者所謂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的胡說，是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也是完全違背客观事实的。

和右傾机会主义者所說的相反，人民公社化是在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闊的前途。

二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随着生产的大发展，广大农民要求适当改进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因此，在人民公社内部，工资制与供給制(主要是粮食供給)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就随着出现了。为什么我国今天的人民公社必須采取这样一种制度呢？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有五亿多农民的大国，不很好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吃飯問題，一切工作都无法更順利地前进。所以我們自建国以来，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且逐步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例如：在土地改革后，有步驟地而又是在較短的时间內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設中，采取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在国家与农民的利益的关系上，采取了兼顧的政策和等价交换的政策等。这些政策方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已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我国过去是一个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的国家，虽然經過几年来的努力，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吃飯問題仍然是个大問題，广大农民每年要以純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来解决吃飯問題。人民公社化以前，农村中每年大体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口多、劳力少的不能抗拒自然灾害的“超支戶”，这些戶不能不依靠国家貸粮貸款、减免农业稅、实行社会救济，依靠合作社实行社会保險、公益金照顧、定量分粮、允許超支等一系列措施，以及依靠群众的互助互济等，来解决吃飯問題。人民公社化后实行的粮食供給制度，正是国家和农业合作社一直采取的社会保險和集体互助办法的繼續和发展，并且从制度上把它固定起来。毫无疑问，这个制度保證了农民有飯吃，解除了广



大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終年愁吃”的沉重負担，因而也使他們能够心情舒暢地参加农业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須解决的一个重大問題。

第二，人民公社实行这个制度是不是办得到呢？我們回答是办得到的。如前所述，由于人民公社集体力量比高級社大，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不断地增加，这就有条件在人民公社内部采取粮食供給制。即使遇到严重灾荒，人民公社也有能力把农民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战胜灾荒。四川省今年遇到較大的灾荒，正是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实行增种补种，并且节约地安排过日子，才胜利地渡过了灾荒，保证了全体农民的吃飯問題。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看不到解决农民吃飯問題在我国現時情况下的重大意义，对于广大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漠不关心，他們攻击人民公社实行供給制是“違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則”，是“絕對平均主义”，叫喊“应当取消”。我們回答是决不应当取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实行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制度，既肯定了現时的人民公社基本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資制度，同时也肯定了带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質的供給制度。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是大有前途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按照四川省目前的一般情况，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供給部分中占有按劳动量应当取得的一部分报酬在內，把这一部分报酬和工資加起来，差不多就达到社員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純粹由公社供給的，只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沒有劳动能力的兒童。这个供給部分占社員的总收入的比重不过百分之三十左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險和集体互助，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推卸的职責，也是适合于广大农民群众当前的实际生活需要的。实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至于工資制部分，我們也同样按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的原則，規定不同的劳动保持适当的工資差額。四川省內江县順江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按照这个原則預算分配的結果，社員从集体中分到的收入，劳力强的戶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而一般戶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劳力强的戶高于劳力弱的戶一倍还多；而就全社來說，百分之九十四点六的社員都比去年增加了收入。这个公社在一九五九年的預算分配，用工資形式分配的部分和用供給形式分配的部份的比例，将是七与三之比。以上事实都可以說明，人民公社实行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並沒有違背按劳分配的原則，因而也不是絕對平均主义。

不可否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但是它并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現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这种因素的出現是必然的，并且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地扩大发展。



还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鼓励和政治挂帅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并不排斥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相反，我们应当鼓励这种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强烈愿望。通过党的政治宣传和号召，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然不可遏止地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过去在革命根据地，我们的部队、机关、学校都实行了供给制，广大干部和群众并没有斤斤计较物质报酬，总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牺牲奋斗。大跃进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干劲冲天，自觉地忘我地劳动，创造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局面。所有这些，证明了党的政治挂帅对于我们事业的极大重要性和决定性。因此，必须把物质报酬和政治挂帅结合起来，否定物质报酬原则是不对的，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也是错误的。

随着农村生产大发展，带来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劳动潜力，特别是解放妇女的劳动力，以适应大跃进的需要。这样，在大跃进中出现大批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事业组织，也是很自然的。公共食堂的出现，保证了社员的劳动时间，增加了社员的劳动出勤率，提高了劳动效率。这就大大地减轻大跃进以来因为农业劳动量激增所引起的劳动力紧张的困难。公共食堂又是集体生活的组织形式。在目前情况下，广大农民把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实行的粮食供给制联系起来看待，坚信公共食堂能保证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加增强了他们依靠集体来战胜贫困和战胜灾荒的信心。因此，公共食堂很自然地成为发展农村生产、生活和宣传教育活动的中心场所。无怪四川农民说：“我们的食堂，是推不垮，解不散，撵不走的。”公共食堂是不是可以办好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确信人民公社能够领导农业增产，保证农民必要的口粮，并且有条件保证种好所需要的蔬菜和喂养猪只。有此三者，加上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为什么农民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呢？还有，公共食堂是不是一定会浪费呢？回答是：只要实行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的政策，并且提倡节约过日子，是完全可以避免浪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公共食堂说得一无是处，并且下令解散。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解散公共食堂，其目的在于搞垮人民公社。很显然，解散公共食堂，是违背广大农民的意愿，是不符合大跃进的要求的，是十分错误的。

三

一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是加速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至将来在农村中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包含了若干



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尽管这种成分在目前所占的比重还很小，但是，它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农村经济将愈来愈起积极的主导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将会逐步增长起来。这是必须看到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且，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共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这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历史任务，就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解决为实现这种过渡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而关键在于人民公社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首先，必须加强对较穷的生产队的领导，在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和提留公共积累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再加上国家的援助，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比较迅速地赶上较富的生产队的水平。根据四川省的若干典型调查，在目前一万人左右的人民公社中，较穷的队与较富的队的收入水平，一般是相差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一万户左右的人民公社中，较穷的队与较富的队的收入水平，一般是相差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而农业的增长速度，在若干年内平均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此，只要公社加强对较穷的生产队的领导和帮助，在二、三年或者四、五年内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提高到或者超过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也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使人民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增加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人民公社必须在保证国家和农民两方面粮食需要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还必须在不妨碍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和国家允许的条件下，创办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所需要的工业和企业，一个公社不能举办的，可以在地委、县委的领导下由几个公社联合举办或在县联社的范围内举办。这样，人民公社的经济力量就会迅速地增长起来，公社的全民所有制成分也将逐步地增加起来。重庆市郊区红旗人民公社是一个“万人社”，由于生产的巨大跃进，今年提留公共积累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倍半。公共积累的增长，使公社经济壮大起来，今年这个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和其他多种经营的产值可达五十八万元，占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预计到一九六一年，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和其他多种经营的产值，可以达到占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坚决要求保持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行部分的生产队所有制。目前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民公社，虽然只是少数，但从这些公社生产的迅速发展中，明显地看出了公社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

要使人民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除了实现上述的几项重要措施外，还必须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了逐步减轻劳动强度，大大提高生产力，不仅地广人稀的地区需要加速实现机械化，就是人口稠密地区也不例外。问题是在于人民公社



有没有充分的资金积累，尤其是取决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在资金方面，我们认为，主要的应当通过人民公社逐年提留公共积累，通过逐年扩大再生产，再加上必要的国家援助，来加以解决。有的公社已经是这样做的（例如郟县红光人民公社）。既然这些人民公社现在就能办到，那么，一些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后，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办到呢？至于我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否与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我们认为可能的。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是包括了农业机械化在内的。我们已经在“大跃进”中给工业布局打下了基础，因此，今后可以逐步增加农业机械的生产，支援农业。同时，我们采取半机械化作为向全机械化的过渡，这就为农业机械化准备了技术条件，因而，也可能缩短农业机械化的时间，使农村一切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地方，有步骤地但又比较迅速地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只要我们通过人民公社，在一定的时间内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只要人民公社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举的方针，并且发展必要的为国家所许可的社办工业，又能够使人民公社具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从而也增加了公共积累；只要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农业机械的生产，就能够促使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提早实现。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又将相应地要求人民公社改进自己的组织规模和各种制度与之相适应。那么，根据中央北戴河会议决议的精神，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设想，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可能办到的。在这个任务实现以后，人民公社将进一步担当起由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



夜牧（木刻）

禾恒



为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 伟大任务而奋斗

薄 一 波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文中提出的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并且在农业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同工业生产一样地实现了大跃进。这样就使农业的发展进一步适应于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并且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为着使工业和农业能够更相适应地和持续不断地向前大跃进，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地和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就是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新形势下的新内容。具体地说来，就是要把我国的农业生产，从主要地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工具，改变为主要地使用机器；从主要地使用人力和畜力，改变为主要地使用机械动力和电力；从主要地使用人力加工肥料的情况，改变为主要地使用机械制造肥料（其中包括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的情况；以便在较短的时期内，使我国的农业从目前的落后技术转移到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来。

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社会主义先进工业国的过程，也是把大量的农业人口逐步地转变为工业人口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使农业的发展能够适应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它们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必须使农产品的生产愈来愈多，农产品的商品率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又要使农业占用的劳动力愈来愈少，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愈来愈高。

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不断地改革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使我国农业在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手工工具的条件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棉花产量达到四千二百万担，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有粮食七百七十斤，棉花六



点四六斤，比上一年每人增加粮食一百九十斤，棉花一点三一斤，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要比较充分地满足全体人民对于食粮的需要，要足够地满足繁殖牲畜对于饲料的需要，我国的粮食产量，至少需要在现有的水平上再增长一倍以上。要比较充分地满足我国人民穿衣的需要，除了积极地从化学纤维方面想办法以外，单就人民对于棉布、棉纱、棉絮的需要来说，棉花的生产至少也需要在现有的水平上再提高两倍左右。而其他农产品和畜产品则需要有更大得多的增长。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情况是：一九五八年由于工业、农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大跃进，使得我国开始由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变成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国家。不但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工业和其他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农村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虽然有很多妇女劳动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村的生产和建设，还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以河北省宁津县红光人民公社为例，这个公社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度，比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度，用于土壤改良方面的劳动力增加了一倍，用于肥料方面的劳动力增加了三倍，用于水利方面的劳动力增加得更多。在这期间，由于精耕细作的发展，平均每亩小麦的用工量增加了三点六倍，平均每亩棉花的用工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其他各种主要作物的栽培，也都大大增加了用工量。这个公社原来共有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一万八千九百五十八人，一九五八年九月至十二月间调往城市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近两千人，转入社办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共有两千多人，因此留在社内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比原来减少了。去年以来，虽然开展了技术革新，改进了劳动组织；今春以来，虽然有一部分劳动力从社办工业方面转回到农业方面来，但是，全社劳动力的安排现在仍然感到困难，畜力也同样感到不足。

这两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已经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了一个新的矛盾，这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要求农业生产成倍以至几倍地增长，而农业生产所占用的劳动力，不论从目前情况或者从长远趋势来看，都不但不能增加，反而将要不断减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方针来解决这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应当怎样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还应当从继续提高社员劳动积极性、合理使用劳动力、改善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生产方法、健全管理制度、巩固劳动纪律等方面，来想办法继续发掘劳动力的潜力。实际上，我们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应当看到，在广大农民目前普遍使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条件下，这种潜力的发挥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加速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不但是农业本身、而且是工业的迫切要求，不但是广大农民、而且是广大工人的强烈愿望。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在合作化时期，由



于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差，而合作社的規模还比較小，因此，那时的农业技术改造还只能采取典型示范的办法，小規模地推行。在現在，由于人民公社化的成功，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成，已經給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創造了良好的条件。

人民公社比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組織規模更大，活动范围更广，集体化程度更高，它可以发展多种事业，进行多种經營。在人民公社內部，目前生产队所有制还是基本的，但是已經有了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公社可以每年从各个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量的积累，可以发展社办事业，可以統一规划全社的生产和建設。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进程，有利于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效力。

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已經大大地加强，我們过去不能生产的拖拉机和汽車，或者过去只能少量生产的排灌机械和化学肥料，現在都已經能够比較大量地生产了。农村需要的鋼鉄、煤炭、石油、化工、电力等工业产品，現在也已經可以比較大量地供应了。不仅如此，一九五八年工业的大跃进，在我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普遍地举办起中小型的簡易生产的企业，单是人民公社举办的农具制造厂和农具修配厂，就有八万多所。这种县办工业和社办工业，是加速农业技术改造的一支有力的突击队。

总之，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要求，是愈来愈迫切了；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有利条件，是愈来愈增加了。因此，我們必須采取积极的步骤来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造，使农业的技术改造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使已經在經濟上巩固地組織起来的五亿多农民同現代化生产技术相結合，成倍地以至几倍地发展农业生产，几倍、十倍以至几十倍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迅速地提高公社和国家的积累，广阔地扩大工业的国内市場。同时，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中，我們的人民公社，就能够在日益雄厚的物質技术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經過一定的時間，在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将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到那个时候，我国的农村，不但将为我国人民提供无限丰富的粮食、工业原料、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且将解放出成亿个劳动力来。这样雄厚的劳动力，是任何国家都沒有的。依靠这种力量，我們就可以在比現在大得多的規模上发展我們的工业，发展我們的运输业，发展我們的文化科学事业，发展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事业。就可以为我們国家、为世界創造出无穷无尽的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

有人認為，要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必須先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要工业化完成了，农业技术改造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因此，他們主張現在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工业，可以不管或者少管农业的技术改造。这种观点显然是錯誤的。当农业合作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基础还非常薄弱的时候，我們的任务是使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經過合作化来促进工业化。在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批判了先有机械化、才能合作化的錯誤观点，批判了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样两件事情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



的錯誤观点，批判了只強調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减弱农业合作化的錯誤观点，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如果过分地強調农业技术改造，其結果就必然放松和推迟合作化，同时也不利于工业化。由于新形势的来到和新任务的提出，現在要批判的錯誤，显然已經不是上述錯誤观点，而是不积极推进农业技术改造来巩固人民公社、来促进工业发展的錯誤观点，是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这两件事情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的、只強調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减弱农业技术改造的錯誤观点了。因为現在如果孤立地強調社会主义工业化，不管或者少管农业技术改造，如果只顧工业本身的发展，而不采取积极的步驟加速农业技术改造，讓农业老是停留在手工劳动的水平上，其結果就不仅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发展速度，而且难以保持农业現在的跃进速度，反过来也就使工业难以繼續跃进。

有人認為，現在就积极进行农业技术改造，会分散使用建設資金和生产資料，而不利于工业的迅速发展。这种观点也是錯誤的。他們不懂得，国家撥出一定数量的資金来发展农业，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粮食和經濟作物，有了这些东西，輕工业就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农业和輕工业更快地发展了，又可以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資金，这样，就可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毛澤东同志早就指出过：“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場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現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設、电力建設、运输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場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們所理解。”^①毛澤东同志的这个論点，已經在去年的大跃进中进一步地得到了証明。一九五八年工业向农业提供的主要生产資料为三十一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提供的生产資料总和五十一亿九千万万元的一半以上；而农业在这一年向工业提供原料約一百四十亿元左右，也比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任何一年都多。因此，这一年在农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同时，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这就說明，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資，增加对农业的生产資料的供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也就促进了工业的更大的发展。同时也說明，工业有力地支援农业，反过来，就会使农业能够更有力量来支援工业。

这些人的錯誤，从根本上来說，就是因为他們不懂得，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应当只是以建立工业内部的完整体系为滿足，而应当通过这个体系的建立来对国民經济各部門特别是农业部門进行技术改造。他們也不懂得，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应当只是以先进技术来武装工业各部門为滿足，而应当使农业和其他国民經济部門同工业部門一样，都用現代化大生产技术装备起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內容，就包含着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对农业和其他国民經济部門的技术改造，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本身的要求，也是重工业各部門本身应尽的不可推卸的職責。以为可以脱离輕工业而孤立地发展重工业，是不对的；以为可以脱离农业而孤立地发展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工业，也是不对的。决不能设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而农民又占五分之四的大国中间，可以离开农业的技术改造而孤立地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也不可能设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可以允许经常出现工业很快发展、而农业极慢发展的局面。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果只是“一条腿走路”或者只是“一条半腿走路”，就会使我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那就不可能在工业战线上和农业战线上全面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我们的建设事业就难免不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重要规律的要求。实行这些方针就可以使我们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片面性，而能够把六亿五千万人民不论是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都充分地发动起来，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使工业和农业都能够互相适应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并且取得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工业同农业对立、城市和乡村对立。它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也需要农业的技术改造，而且也能够一定规模、一定程度上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但是，它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农民破产和失业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不断用新的技术来装备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过程，也就是使乡村和城市的差别逐步缩小、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固然不能建立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私有制两个不同的基础上，而且也不能够听任工业的现代化生产和农业的手工劳动长期并存。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中，有五亿多农民使用手工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都很低，这是旧中国的遗产，是我国经济落后的表现。当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造不但有同时并举的必要、而且有同时并举的可能的时候，如果还不积极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在过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在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应当离开农业技术改造而孤立地进行。我们应当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这样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应当使农业技术改造的步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可以肯定，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就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也难以迅速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程度愈高，支援工业的力量就愈大，也就愈能够促进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和人民公社化的胜利，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地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只要我们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这样，我国工农联盟就能够在同样水平的现代化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更加巩固起来，为将来实现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伟大理想创造条件。

我国农业的合作化，是经过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这样三个互相衔接的步



驟而进到人民公社的。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将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经过由旧到新、由低到高、由少到多的过程，而逐步地实现。这个过程我们设想大体上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从今年起，四年左右得到小解决，七年左右得到中解决，十年左右得到大解决。这就是说，到一九六九年左右的时候，我国凡是可以使用机器耕种的土地，就可以基本上不再用畜力耕种，而基本上将采用机器耕种；凡是需要用机器灌溉的土地，就可以基本上不用人力灌溉，而可以基本上实行机器灌溉；农村运输就可以基本上不再用人力和畜力，而基本上使用汽车；农副产品的加工工具，都可以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全国生产的化学肥料，按每亩平均计算将比现在增加六、七倍。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向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而使我国农业的面貌得到根本的改变。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区辽阔，各地方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互不相同，由于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是逐步增加的，所以，农业的技术改造，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必须积极地而又逐步地实行。在目前时期，还应当新式机器和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在四年以内，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分期分批地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而就全国范围多数地区来说，大量采用的将是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到了七年以后，大量采用的将是新式机器，而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仍将发挥它们的作用。

在目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应当怎样来执行新式机器和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的方针呢？

就机械来说，一方面，多数地区，多数农业生产部门，是对现有的农具、提水工具、运输工具和农副产品加工工具进行改革，同时研究设计和试制各种新式的和半机械化的工具。各县，各专区，各省、市、自治区，都应当设立农具和其他工具的研究所，进行工具改革的研究和试验工作。另一方面，在土地多劳动力少、交通方便、农产品商品率高的地区，如农垦地区、工业发达的地区、大城市的郊区、经济作物区等等，应当积极进行农业机械化，并且首先把那些特别费力的手工劳动改变为机械操作的劳动。

就动力来说，一方面，多数地区，多数农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合理使用现有的人力、畜力、水力、风力和其他动力，并且认真保护和大力繁殖各种役畜。另一方面，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可能采用的机械动力，并且应当发展中小型的电站。

就肥料来说，一方面，应当大量地发展畜牧业，增加畜肥、绿肥和其他有机肥料，同时积极利用当地的条件，制造肥效较高的土化肥。另一方面，国家应当积极发展化学肥料工业，迅速增产各类化学肥料。化学肥料的使用，应当首先满足那些对国计民生最关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需要。

不论农村现有工具的改良，或者是新式机器的采用，都必须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都必须先进行试验、然后逐步推广。那种不顾各地方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和不同要求，而采取千篇一律和一哄而起的做法，显然是有害的。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



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有精耕細作的傳統。在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形成以后，这种經驗和傳統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們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造的时候，应当吸收这些丰富的經驗，发揚这种优良的傳統，而不要随便否定它和丢弃它。

适应于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新式机器和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的要求，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同样必須实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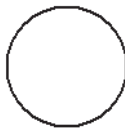
大型工业企业是支援农业的主力軍。我們应当积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型工业企业，扩建或者新建一批农业机械厂、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化学肥料厂、农葯厂、汽車厂等等，尽可能地多增产为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包括石油等燃料在內），并且注意改进这些产品的质量，以便逐步地用现代化技术武装农业。

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县、社举办的工业企业，是支援农业的地方軍，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中小型企业分布面广，接近农村，能够更好地滿足不同地区的具体需要。它們不仅可以制造改良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其他的农业生产資料，以补大工业的不足，而且还可以担当农业机械和其他設備的修理任务。同时，在劳动力資源上可以和当地农业生产結合利用，在物質資源上也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为大工业所不能利用的零星分散的資源。我們应当积极发展这种中小型企业，并且进一步地使它們明确为农业生产和建設服务的方針，以便它們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能够担当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的任务。

为了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大型工业企业除了直接提供农业所需要的各种机器、动力、燃料和化学肥料以外，还应当尽可能地帮助中小型工业企业（包括县、社工业）的发展，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新的設備或者更換下来的旧設備，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原料和材料，为它們培养技术力量等等，以便提高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它們为农业技术改造服务的能力。

把我国地区这样广大、生产技术这样落后的农村，全部地改造成为拥有現代技术的农村，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現在的問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全面规划。中央有关部門和省、市、专区、县、社，以及各級的有關部門，对于农业技术改造的发展步骤，新式机器和改良工具的同时并举，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分工合作，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互相支援，技术人材的培养和科学試驗的发展，都应当按照实际状况，进行全面的具体的规划。

我們有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有几亿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坚强意志，有一支主力軍和地方軍互相配合的工业力量，又有人民公社这样具有偉大生命力的社会組織，毫无疑问，我們一定可以在預定的时期內，完成农业技术改造这样一个偉大的历史任务。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

——人民检察工作十年的基本总结

张鼎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立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功伟绩。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已经被废除，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建设成就辉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现在，无论农村和城市，都是欣欣向荣，一片光明。我们的国家，已经以空前巩固和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在短短十年当中，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成功地实行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由于在整个过渡时期内阶级斗争始终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就不但要夺取政权，而且要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起自己的专政，以镇压反革命的抵抗，保证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理论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并且“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们：“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①毛泽东同志这篇伟大著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9、10、14页。



我国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我国人民在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就是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国内外反动派时时刻刻都在妄想推翻我们，妄想在中国复辟。大家知道，蒋介石集团是我国历史上集古今中外反动统治之大成的一个庞大的末代皇朝。这个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但它的阶级基础并不是一下就可以完全消灭的。这个反动集团所豢养的爪牙——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还散布在国内各个角落。这些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对于我们彻底完成民主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和破坏。同时，美帝国主义乘着我国新中国建立还不久的時候，就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霸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千方百计地派遣特务间谍进来搞阴谋破坏活动，妄图恢复它在中国的反动统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国内最突出的矛盾。一部分抗拒改造的城乡资产阶级分子，不断地从各方面阻挠我们事业的前进；而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则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我国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国内外反动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总是妄想阻挠历史巨轮的前进。

但是，国内外反动派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成功地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地前进。我们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专政，对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专政，都是彻底的，正确的，成功的。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了。并且依靠着团结起来的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的力量，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工作，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现在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在向好的方面变化，不少人已经改造成为新人。对于那些敢于造反，敢于捣乱的反革命分子，就坚决地予以镇压。十年当中，我们国家运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发动了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深入到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规模是巨大的，而且是一步一步深入的。结果，彻底而又准确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民主专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进道路；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又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人民民主专政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庭和监狱等武器，来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实行的专政。人民检察机关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之一。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运用人民检察机关这个武器，米



同国内外反动派作斗争。

承担着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执行人民民主专政任务的人民检察机关，十年来积极地投入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始终把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人民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决定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对劳动改造工作的检察、对社会改造工作的检察等法律监督职能，把自己的斗争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派遣潜伏的特务间谍分子，指向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指向有严重血债和民愤很大而又拒不投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指向严重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的其他犯罪分子。同时，在这个斗争中，又注意了防止偏差，保护好人，保证了斗争的正确进行。这样，我国人民检察机关，在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中，充分发挥了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人民检察机关所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获得巨大的成绩，就是因为我们在方针政策、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方面，都坚持执行了党所制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并且在执行正确路线的过程中，总结了经验，教育了干部，壮大了队伍。

在方针政策方面，人民检察机关历来注意严格分清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专政的矛头指向敌人，并且在对敌人的专政中，采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

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大多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是区分两类矛盾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已经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是反革命势力当中最坚决的部分，对他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实行专政。对于那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所以我们就有可能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一般地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达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分子都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就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过猖狂进攻。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击退他们的进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但是在处理上，只要他们没有触犯刑律，仍然可以不用法律惩办。至于对那些从政治上、经济上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又触犯刑律的资产阶级分子，那是必须依法惩办的。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劳动人民当中也有它的反



映。我国劳动人民的絕大多数，社会主义觉悟是很高的，但也有极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受了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蝕，而发生犯罪现象。这种现象，在阶级斗争没有消灭以前，还会长期存在。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消灭了产生犯罪的经济基础和逐步清除剥削阶级思想，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用说服教育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因此，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人民内部的犯罪现象越来越少。对于人民内部的犯罪现象，虽然也要依法处理，但这只是作为说服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同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至于那些已经转化成为敌我矛盾的犯罪现象，那当然是属于专政的范围。

人民检察机关正因为在工作中严格分清和正确处理了两类矛盾，既防止了看不见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右倾偏向；又防止了夸大敌我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左”倾偏向；而且能够根据两类矛盾的互相转化，在处理方法上也随之转化。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

人民检察机关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惩办，历来是坚决的。因为，对敌人不能讲仁慈，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迫使反革命分子放下屠刀，就不能够迫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就不能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国家在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时候，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对于少数罪行比较严重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判处徒刑；对于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则判处死刑；对于占大多数的一般反革命分子，则是留在社会上，采取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监督生产等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只要真正改恶从善，我们就宽大对待，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减刑、免于起诉、安置职业等，立了大功的还给予奖励。但是，经过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又重新犯罪，那就再捉再办。实行这个政策，就有力地打击和分化了反革命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国家所以惩办反革命分子，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重要的是为了剥夺他们借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条件，以便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根本上肃清反革命和消灭犯罪。因此，我们对于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对于留在社会上的一般反革命分子，则把他们放在劳动群众的生产组织中去，依靠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劳动和教育改造。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阶级斗争和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多数反革命分子经过改造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已经改恶从善，得到了宽大处理。不少罪犯经过改造以后，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近，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我们国家对于一部分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这些都说明了我们执行惩办与宽大



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人民检察机关坚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把自己的斗争锋芒对准敌人，对敌人采取正确政策，结果就有力地保证了对敌斗争又狠、又准、又稳地进行，并且分化瓦解了敌人，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民检察机关也一贯坚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同国家的其他专政机关紧密合作和互相制约，并且把自己的专门工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密切结合起来。

我国人民检察机关和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共同对付敌人的关系，共同执行人民主专政任务的关系，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首先不是这样一种互相合作的关系，就不能够强有力地对敌人实行专政。我国的专政机关历来是紧密合作、团结一致的。人民公安机关在对敌斗争中是英勇机智的，执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对于案件的侦查、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以及治安保卫等工作，都是做得出色的。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是极其严肃、谨慎的。他们都模范地遵守法律。因此，人民检察机关对于他们的工作始终给以积极的支持。当然，由于这三个机关的具体职能不同，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有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是好事。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作出正确的决定，更能保证三个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正确地执行国家法律。因此，这三个机关的关系，又是在共同对敌的基础之上，互相制约的关系。不仅人民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对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活动实行监督，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也可以提出来；法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审判活动，监督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工作。实践证明，我国法律规定的这三个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是优越的，执行的效果是良好的，既保证了我们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保证了对敌斗争的准确性。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的专政机关是建立在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基础之上的。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我国劳动人民，很清楚地知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是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人民群众对于任何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嗅觉和视觉十分敏锐。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事实上已经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民群众的这种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人民检察机关，同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一起，始终都是紧密地依靠这种力量，进行镇压反革命斗争的。在历次镇反运动中，我们都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动员群众积极地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号召群众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事实上，大多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被群众检举和揭发出来的，不少反革命分子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投案自首。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惩办，那是由



国家专政机关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但是我国专政机关就是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也经常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比如人民检察机关常常采取携卷下乡、就地办案等方法，到群众中去进行辩论，研究某些反革命分子是否应该逮捕，是否应该起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准确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丰富了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

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的预防工作，对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改造工作，人民检察机关也是同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一起，一向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的。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当中，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安全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发生任何犯罪案件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城镇基层单位。实践证明，安全运动是专政机关依靠群众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人民公社的一种好形式。

无论是国家专政机关的专门工作，无论是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都必须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为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这个专政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十分艰巨、复杂、尖锐的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所以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乃是人民民主专政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十年来，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全部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的，正是共产党；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定正确路线的，正是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中英明地领导着人民民主专政事业的，正是共产党。我们人民检察机关的经验也是如此，必须把检察工作完全置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并且不断地用党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干部的头脑，增强干部的党性锻炼，才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最深刻的体验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在工作方法方面，人民检察机关从来就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人民检察机关为了很好地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一定要协同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我国过渡时期的情况表明：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是长期的、激烈的；虽然从总的方面来说，随着我们的政权日益巩固，人民群众的组织和觉悟程度日益提高，反革命总是越打越少，越来越弱，敌我斗争是越来越向有利于我们的方面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前进过程，从敌人的活动来讲，是有起有伏的，从我们的斗争来讲，是有紧有松的，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来说，又往往表现为此起彼伏、此紧彼松的形态。为了切实地掌握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的这种实际形势，就必须结合党的中心工作，深入实际斗争，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否则，就容易脱离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的实际形势，不能适时地、准确地打击敌人。



同时，还应当协同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反革命分子、反动阶级、反动派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的基本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社会阶级的政治动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人民检察机关应当经常对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情况，或者是某种类型、某个地区、某个时期的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工作，研究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以保证正确地执行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

对于每一个案件，人民检察机关都应当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在处理案件的时候，详细地占有全部犯罪材料，周密地搜集各种犯罪证据，同时重视每一个反面材料和反证，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证据论者，反对不从实际出发，不充分搜集证据，不重视证据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反对不分析研究客观事物，不分析研究证据，只停留在问题的现象上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所规定的处理案件的原则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格禁止刑讯逼供。人民检察机关和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一直是严格遵照党的这些原则办事的。

为了在全体检察干部中树立这样一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人民检察机关经常组织检察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了解阶级斗争、敌我斗争的实际情况。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深入实际和学习理论，检察干部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断得到发扬，保证了我们能够正确地执行方针政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证了我们能够在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既具有充沛的革命热情，又保持科学分析的头脑；保证了我们坚持执行党所制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

由于始终坚持贯彻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十年来人民检察机关在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贯彻这条正确路线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遇到障碍的。在某些时候，还有人坚持一种同我们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这种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混淆两类矛盾，忽视对敌人的专政，甚至把检察机关的斗争锋芒转向人民内部；忽视党的领导，片面地强调对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制约作用，强调特权，闹独立性，脱离群众，孤立办案；脱离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形势，不调查，不研究，孤立地从法律条文出发，脱离实际，主观臆断。很明显，这种错误路线的基本倾向，是否定人民检察机关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性质，是动摇和阻挠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用超阶级、超政治的虚伪面目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从内部来篡改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一种表现。十年来，我们不间断地同这种错误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经过一九五二年的司法改革运动，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种错误路线受到了彻底的清算，人民检察机关的广大干部更加坚定地掌握了正确路线，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更加提高了。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已经空前巩固和强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放松警惕了。革命同反革命之间还会有长时期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彻底解决。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会不断地进行捣乱。因此，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任务。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武器之一的人民检察机关，仍然要毫不动摇地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坚持贯彻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

换了人间

馬錫五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了。十年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祖国的面貌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本质，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本文仅就流氓、盗匪、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在解放前猖獗泛滥和解放后被迅速清除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化思想的腐蚀以及失业、破产、贫困的逼迫，使得很多人走上邪路。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更直接收买、利用大批坏分子，作为统治人民的爪牙。反革命势力与许多流氓、盗匪集团密切勾结，相互依存，并混为一体。各种坏分子虽然只占人口中的极少数，并且遭到善良正直的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反对，但由于他们受到反动统治者的支持和纵容，而万恶的剥削制度本身又是产生各种罪恶的根源，因此，他们就能够猖狂地进行各种罪恶活动。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使广大人民陷于失业、破产和贫困的深渊。少数剥削者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剥削阶级损人利己、享乐腐

旧中国无论大小城市，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流氓组织。在他们的组织中设有大小头子，各占一行，各霸一方。许多大流氓头子都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起家。他们广收门徒，豢养打手，积极扩张本门势力。上海有些大流氓头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錢，繼續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把興無滅資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相信，只要這樣做，人民檢察工作就會在已往十年的基礎上，更好地完成人民民主專政所賦予的光榮任務，對於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十年來，我國人民檢察機關在堅持執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所制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正確路線的時候，也認真地學習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今後我們還將繼續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學習，並且結合我國的具體實踐，不斷總結新的經驗，使我國人民檢察工作沿着正確的路線，從勝利走向勝利。

成為參與蔣介石集團政治、經濟事務的“黨國要人”，他們的徒子徒孫滲入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為國民黨反動派充當特務。帝國主義租界的許多包探、巡捕，也是由這些人擔任的。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就曾依靠上海流氓所組織的“反共協進會”，發動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殺。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和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都曾指示他們的部下：“要盡量在流氓幫會內發展組織，做到組織內部非徒弟即兄弟。”

這些流氓充當反動統治者的幫兇，騎在人民頭上稱王稱霸。上海蜜蜂毛絨廠流氓特務陳小毛，曾仗勢強姦女工一百多人。“滬西半月天”柏文龍組織“掛戶黨”、“拆屋黨”、“斧頭黨”，按月向群眾勒索款項，稍不如意就唆使黨羽行兇，隨便殺害人命。廣州市“粵東五分社”等流氓集團曾專門“拉豬仔兵”，即強拉農民和外地客商賣給偽軍當兵。北平市“四霸天”之一的流氓頭子林文華，常拿活人當他練拳的靶子，不是把人打死就是打得吐血。天津市流氓薛桂芳養的狗，在玉生祥米面鋪偷吃東西被打死，薛桂芳就帶領打手先砸毀米面鋪，又迫使該鋪經理給狗買棺木做

壽衣，打幡送殯。這些流氓無惡不作，他們的活動範圍，涉及到凶殺、強姦、搶劫、偷盜、詐騙、敲詐勒索、包運煙土、包打群架、販賣人口、開設賭場和妓院等各个方面。

在舊社會，搶匪、竊盜、騙子也是成幫結伙。他們的罪惡活動，使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許多人因被搶、被竊、被騙而走投無路。據上海市偽警察局顯然縮小的統計數字，該市在解放前夕每月發生搶劫、綁票案一百三、四十件，平均每天四、五件。天津市在解放前夕有搶匪八百餘人，慣竊一萬二千餘人。江蘇省著名的盜匪集團“水火幫”，幾十年來經常出沒於太湖、長江鄰近地帶殺人越貨。天津塘沽區著名海盜“慈死人”、“金牙老六”等時常結伙在海口外洗劫貨船，槍殺船主船工，沉船滅迹。重大的搶、竊、騙集團的頭子多與流氓組織、地方惡霸和偽警察局有着勾結。不少偽刑警人員就是大流氓的徒弟或竊盜集團的頭目。不少搶、竊、騙集團在作案後，按“規矩”都要提出一些贓款作為賄賂偽警察局的“積金”。農村中打家劫舍、奸淫燒殺的土匪時常被國民黨反動派成股地加以收編，作為鎮壓人民革



命活动的一种武装力量。

从英帝国主义开始向我国输入鸦片到全国解放前，烟毒在我国蔓延了一百多年。特别是日寇侵入我国以后，在沦陷区实行“毒化政策”，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起来。中国反动统治者历来就勾结帝国主义和流氓势力，把制毒、贩毒作为“生财之道”。解放前，仅上海一市的制毒机构就有三十多处，从事制毒、运毒、贩毒的有三万余人。在广州，据伪社会局一九四九年五月份不完全统计，全市烟馆共一千三百多户，有“烟馆多于米铺”之称。国民党反动派以禁烟为名，命令烟民登记，调整烟馆，便于官方统一专卖，所谓禁烟机构实际就是制毒和贩毒的机构，因此愈禁愈多。成千上万的吸毒者倾家荡产，有的骨瘦如柴，瘫毙街头；有的沦为盗匪，为非作歹。

在旧社会，赌窟、妓院林立。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场、跑狗场等大型赌场，每场都有千人以上进行赌博。地痞流氓也勾结官府大开赌局。广州的赌场有三千余所，以赌为业的约三万人，赌场专设电船七十余艘迎送赌客。至于供剥削阶级淫乐的妓院，则遍设于大小城市，国民党反动政府还以此增加税源。上海市在日伪统治时期，正式登记的妓女有二万余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以后，据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上海市年鉴”刊载，当时该市“依卖淫为活之娼妓，无论直接间接，估计不下十余万人”。各地妓院的窑主都是流氓恶霸，他们贩卖、诱骗、强迫许多贫困的妇

女做娼妓，以“卖绝”（妓女终身无人身自由）、“雏养”（拐买女孩，养到十三、四岁即迫令为妓）、“包账”（定期押卖）、“拆账”（名为与妓女分账，实际上大部分收入归妓院主所有）等方式残酷压榨妓女，还强迫患病、怀孕的妓女接客，用皮鞭、铁棍毒打妓女，用烙铁烫妓女，有的被活活打死，甚至有的妓女患重病未死就被钉入棺材内埋掉。

旧社会的罪恶是数不尽说不完的，这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也叫喊着禁烟禁毒、取締娼妓、惩办盗匪、反对流氓，实际上这只是欺騙人民的惯技。他们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他们也曾惩办过一些盗贼，除了因为反动势力内部有时发生磨擦外，不过是包庇“老虎”打“苍蝇”，甚至诬良为盗，借以蒙蔽群众的耳目。当时，许多重大刑事罪犯在作案后被群众举发，只要犯罪集团的“老头子”向伪警察局打个招呼，就可以安然无事，继续作案。反动官员对社会上的重大刑事案件，甚至还直接参加。象一九四六年上海轰动一时的荣德生被绑架案的主犯就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作案时用的“逮捕证”是伪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用的汽车是伪警备司令部的。湖南省邵阳市永和金店遭匪抢劫，并杀害两条人命，这一大案的主凶是湖南省伪第六区专员孙佐齐和专署秘书傅德明。武汉市刑警喻有才，是管领三百多名窃盗的头子，这些窃盗按月送款到他家。这样亦官亦匪、一身二任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广大人民深深地懂得，要依靠罪魁祸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来



改变旧社会的罪恶面貌，无异于痴人说梦。群众描述当时的情景说：“百姓吃不饱，警官养肥了，白天怕强权，夜晚怕强盗，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告”，真是一点也不假。

二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旧社会的一切妖魔鬼怪从此就失去了依靠。多年来被压抑的六亿人民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经发动，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扫除一切反动势力的残余。尽管旧社会遗留下的反革命分子和流氓、盗匪等坏分子成群成堆，尽管他们在失去靠山后还妄图继续与人民较量，但是，在伟大人民的铁拳下，这些妖魔鬼怪成不上几个回合，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就被打得粉碎。

中国人民经过了十年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英勇斗争，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国泰民安，繁荣兴旺，不但反革命残余已基本肃清，而且刑事犯罪案件也已经大大减少。最近几年来，全国若干类重大刑事案件（包括凶杀、纵火、搶劫、强奸、盗窃、诈骗等）的平均发案率逐年下降，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六七。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案件的下降尤为显著。仅北京、上海、湖南、陕西四个省、市，今年上半年初审刑事收案的总数，就比一九五八年同一时期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五四。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干劲冲天地

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流氓、盗匪横行和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泛滥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陈述了。抚今追昔，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幸福。

在我国，那些长期勾结国内外反动派压迫人民、罪恶滔天的恶霸兼大流氓头子，那些长期被国民党官僚、特务所掌握的封建帮会和政治性的流氓组织，在一九五〇年开始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就已经受到粉碎性的打击。旧社会那些在城市中分股活动、奸盗邪淫无所不为的大小流氓集团及其骨干分子，相当一部分已在解放初期受到惩处，剩下的残余党羽经过以后几年的惩办和改造，现在也基本上肃清了。上海著名的游艺场“大世界”，解放前从总经理、高级职员到一般管理人员，几乎全是流氓，场内到处都有特务作恶，流氓行凶，扒手偷钱，妓女拉客，骗子行骗，还有许多荒淫下流的黄色节目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是一个典型的诲淫诲盗、藏污纳垢的罪恶场所，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遭受迫害和灾难的火坑。解放以后，“大世界”经过民主改革、反霸斗争，已经彻底改变了面貌，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娱乐和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幸福场所。许多解放前到过“大世界”的中外人士都感慨地说：“大世界真的变了！”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它不仅反映了“大世界”的变化，而且象征着整个上海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流氓恶势力的连根铲除。现在，在我国各地，不论是工厂、农村、街道、码头、车站和娱乐场所，人们再



也看不到横眉整眼的流氓作威作福欺压人民了。

在解放初期，我們消灭了成千累万的反革命股匪和許多职业性的盗匪集团。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搶劫案件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直线下降。目前，这类案件已基本肃清。以一九五八年若干省、市搶劫案件的收案或发案率为例：辽宁省初审收案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七，天津市初审收案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六点三；上海市的发案率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在大陆上，而且除蒋介石集团盘踞的台湾外，也反映在我国领海上。前面說过的天津塘沽区沿海一带，解放前海盜活动甚为猖狂，解放后，十年来同一地区內从未发生过海盜案件。人民群众对匪患的清除是极为满意的，他們热情地歌頌道：“自古到民国，土匪未肃清，来了共产党，土匪断了根。”

在城市中危害面較广的窃盜、詐騙两类罪犯，解放后，經過历次运动的打击，不但作案的数量大大下降，而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师徒相授、父子相传的老慣窃、老騙子和成帮結伙的窃盜、詐騙集团，也已基本上肃清了。如上海市一九五八年窃盜、詐騙案件的发案率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天津市一九五八年初审窃盜案件比一九四九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一，初审詐騙案件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如按发案時間計算，实际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三点四）。由于絕大部分老慣窃、老騙

子已受到惩办和改造，因而大案极少发生。旧社会因贫困所迫而淪为强盜、小偷的人，現已絕迹。解放前，上海的药水弄石灰窑一带原是臭水浜，到处都是茅草棚，强盜小偷成群。附近居民有“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之說。現在，这里已經盖起了楼房，清洁卫生搞得很好，强盜、小偷已經肃清，家家戶戶都过着太平的日子。

旧社会数不清的烟、賭魔窟，已經摧毁无遺。許多在旧社会吸毒成癮的烟民，都已在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下彻底戒除烟癮，成为健康的公民。广州市的烟民金香，原来不会吸毒，自从到国民党的“禁烟”机关工作后，学会了吸毒，不但家財耗尽，而且連老婆、孩子都被他卖掉。解放后，这个“烟鬼”戒除了烟癮，經過改造参加了工作。象这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金香的例子不过是千万事例中的一个。賭博行为在全国范围内也已基本絕迹，許多曾染有賭博恶习的人提高了觉悟，連賭具也自动地交出来銷毀了。

几千年来剝削階級社会中压迫、蹂躪妇女的野蛮殘酷的娼妓制度，在我国已經最后地結束了。解放初期，我們有计划地取締了妓院，严惩了一批妓院恶霸和人口販子，解放了成千累万的陷身火坑的妓女，这是曠古未有的好事！北京市的妓女把它歌頌为：“春天的霹雷一声响，囚犯們打开地獄的門”、“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这几句話真实地唱出了全国无数被解放的妓女欢欣鼓舞的心情。过去絕大部分身染梅毒的



妓女，解放后经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治好了疾病，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改变了游惰习气，学会了生产技能，已经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并且建立了幸福美好的家庭。如在北京市某印染厂的一个车间里，有六十三名女工是从妓院里解放出来的。现在她们之中已有二十多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十人参加了共青团，其中一个表现特别突出的，在一九五五年已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和全国纺织工人的先进生产者。

十年来，犯罪分子经过劳动改造、思想教育转变成新人，并积极参加生产建设的生动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原来绰号叫“上海阿康”的流氓头目康妙根，手下有二、三百流氓徒弟，到处包打群架，敲诈勒索，经过劳动改造，认识了自己的罪恶，在劳动中表现积极，提高了技术，现在已是五级建筑工人，并带领二十多名徒工学会了技术，大家都叫他“康师傅”。曾在香港行窃十八年的著名惯窃仇治本，一九五二年到广州后，被我收容改造，几年来思想上有了显著转变，在劳动中积极带头，并能帮助别人，今年五月已改变了成份，并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都说明了新社会改造坏人的伟大力量。

三

十年来，我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流氓、盗匪等坏分子和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的迅速被清除，使许多熟悉旧中国情况的外国人士感到惊讶。其实，这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

展的结果，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实施正确政策的结果，是我们坚持不懈地采取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

我国社会上刑事犯罪现象之所以大量地不断地减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要消灭剥削和贫困，消灭阶级，从而消灭犯罪的。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对社会主义的一切敌人实行专政。“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①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小撮危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分子必然面临着被彻底肃清的命运。

我国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为打击各种重大刑事罪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日益强大，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群众中已经搞臭；我国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现象已经消灭，公共福利事业普遍创办。这就大大缩小了产生犯罪现象的社会基础和思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想基础。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进一步提高，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活动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也就更加缩小了。

我们党所制定的对各种罪犯所实施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是消除各种罪犯的锐利武器。除了对极少数罪恶严重和民愤极大、该杀而又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外，对于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按其犯罪情节、悔过程度分别对待，从重或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实行劳动改造。对于偶然发生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一般采取教育的办法，不给予刑事处罚。对于刑满释放分子一般都安置就业，使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谋求正当的生活出路。十年来，我们已经改造了一大批罪犯，使他们由旧社会的渣滓变为新社会的劳动者，真正做到了化社会上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之一。

我们在打击刑事罪犯的斗争中，如同在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一样，一向是采取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由于我们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因而就能揭露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犯罪分子，使他们到处陷于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无法藏身，更无法乘隙活动。这是我们国家肃清犯罪的无比强大的力量之所在。

我们国家肃清流氓、盗匪、烟毒、赌博、

娼妓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成就是伟大的，但这并不是说，在这方面已经一点问题也没有了。首先，还有残余的坏分子，他们还要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我们国家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以后，剥削阶级特别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残存着，仍然会对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发生腐蚀作用，产生新的刑事犯罪分子。还须特别指出，在我国，目前还有反革命分子，他们是产生刑事犯罪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在继续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同时，继续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彻底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仍然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犯罪的根本保证。我们确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今后犯罪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必将更加缩小，犯罪现象必将更进一步地不断地减少。

更正

本刊上期(1959年第19期)第34页注①第2行“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一九五八年重工业品降价较多”，应改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品的价格逐步降低”。

第44页倒数第8行中，“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五倍多”，应改为“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



★ 各地党委刊物論文摘要 ★

馬克思主义大放光輝的十年

摘自“團結”(貴州)一九五九年第十期社論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不断地获得輝煌成就的十年，是党的总路綫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当然也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大放光輝的十年。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称得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在于它科学地論証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如何实现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打破资产阶级的統治和鎮压剝削者的一切反抗，建立起并不断地巩固住自己的政治統治权。在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里，都必须如此。无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从以下两方面取得完成这伟大历史任务的力量：第一，不断地发展和加强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反扑，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第二，在本阶级内部特别是在这个阶级的先鋒队内部，建立自觉的鉄的紀律，这是为解决第一个方面的任务所绝对必需的。

我們党制定的总路綫，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原理，并使这些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創造性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我們党出色地解决了前述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关于无产阶级要不断地发展和加强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的任务。早在民主革命阶段，我們党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即提出了著名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阶段，群众路綫仍然是我們党在一切工作中所遵循的一条根本路綫。这个问题关系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果我們承認历史是人民群众創造的，而不是少数英雄人物創造的，这样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没有理由不在一切斗争（不論是革命或建設）中貫徹群众路綫，就没有理由不去充分发动群众。其次，要不要群众路綫，就涉及到我們是不是相信“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說，如果我們以为人民群众的解放，是少数人可以恩賜的、可以包办得了的，而不是依



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那我们就不配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要不要群众路线，要不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原则，即人的主观如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问题。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或实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不待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建国十年来的历史，说明了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立者们所最重视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创造毅力这一问题，一贯地放在首先考虑的地位。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总结了这些运动的经验，把它加以理论的概括，在一九五八年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条总路线的鼓舞下，出现了各个建设战线上的大跃进形势，出现了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

可以这样说，有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能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向前发展，许多事情就能多快好省地进行。反之，如果没有这种群众运动，革命和建设，就只能是在少数人冷冷

清清的情况下进行，就只能是少慢差费。在热火朝天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先进的理论必然受到检验，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革命的干部和群众也必然会得到锻炼和提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看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说过：“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革命的敌人，反对群众革命运动，固无足论；而指手画脚地批评群众运动，或者前怕龙后怕虎，以无穷忧虑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或者以种种清规戒律限制群众运动，都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决然不取的。

无产阶级为要团结和率领广大群众前进，就必须使自己的阶级队伍特别是它的先锋队，表现出坚强的团结、极大的坚定性和模范地遵守铁的纪律的精神。要别人不动摇，首先需要自己坚定。不如此，就不能够抵制和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习惯等保守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松懈散漫情绪的袭击，也就不可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团结，就必须有自己的领导核心、自己的领袖。这个领导核心或领袖，是在群众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代表，是千百万群众的化身，是广大群众利益和要求的体现者。不了解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作用的人，往往也不能了解领导核心和革



命领袖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证明，为贯彻党的总路线，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必须同一切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及其一切败坏纪律和破坏党的领导核心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过去十年里，我们党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洁上，在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上，也一直进行着顽强勇敢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我国旧的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消灭，但资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彻底克服；城乡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还远没有彻底消灭。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着。这种情况，不能不在革命队伍内和党内有所反映。因此，加强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队伍的团结，加强党的纪律性，反对各种形式的右倾动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就成为当前保卫和贯彻党的总路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斗争任务。

坚持政治挂帅的方针

摘自“解放”（上海）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陈丕显：“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

政治挂帅，是我党悠久而光辉的革命传统，是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任务。去年以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出了万丈的光芒，革命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愈益证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政治挂帅”的方针，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懂得并且善于在一切工作中坚持这一条方针了。更不

是说，没有人怀疑、甚至反对政治挂帅了。那些怀疑和反对政治挂帅的人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论调。我们必须彻底地批驳这些错误论调，坚持政治挂帅的方针。

有些人说：“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客观经济规律”。他们把政治挂帅同经济规律对立起来，在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的借口下，否定政治挂帅对认识、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只有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才能够去发现客观规律和认识客观规律。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有些人把“客观规律”同“政治挂帅”对立起来，其实是把“少慢差费”作为他们想象中的“经济规律”。极少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企图由此从根本上否定真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路线，他们无非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是善良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政治挂帅对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重要意义，片面强调客观条件，贬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而有一个时候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右倾松劲情绪，对于一些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去动手做了，一些经过千方百计可以克服的困难，也不去克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反映了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的，我们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去做，政治挂了帅，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就进一步鼓起来，生产就按旬、按月地直线上升。这不是正好说明政治挂帅对认识客观规律、对促进生产的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吗？

有些人说：“政治挂帅不能代替业务工作”。他们看不到：有两种业务工作，一种是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业务，一种是为资本主义政治服务的业务。任何业务工作都不能不由政治来挂帅。不由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便由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我们一切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军事工作都是无产阶级用以进行革命和建设斗争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我们都必须把政治和业务工作的位置摆正，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列宁同志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①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就向我们指出：“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②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在文艺工作方面，他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③或者无产阶级的政治，或者资产阶级的政治，非此即彼，又如何能不坚持党的领导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旗帜高高举起呢？当然，为了把工作搞好，我们应该十分注意业务和技术的提高。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决不能放掉主导的一方面，就是要以政治作为业务的灵魂，以政治来指导业务，指导日常工作。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不认真做好政治工作和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7—8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67页。



工作，那么业务也好，技术也好，一切都无从谈起的。

有的人說“政治挂帅是同‘物質利益鼓励’原則相矛盾的”。我們党一貫主張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同物質鼓励結合起来。只有坚持政治挂帅，才能更正确地贯彻“物質鼓励”的原則。什么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利益呢？这就是建立人类最幸福、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决彻底地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以最快的速度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且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才是从最根本的利益上关心群众。也只有以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去鼓舞教育群众，他們才能在大跃进中奋不顧身、不計报酬地忘我劳动。人們都还记得，早在去年大跃进中，广大群众提出的“几年辛苦，万年幸福”、“要政治挂帅，不要鈔票挂帅”的口号，就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高漲。这是党长期以来坚持政治思想教育的結果。正象列宁所說，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識不可能自

发地产生，而“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有些人以为只有靠經濟上的刺激，才能鼓励劳动者的积极性，至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則放在极不重要的地位，因而他們所說的关心群众的物質利益，实际上就是放松或者放弃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我們坚持政治挂帅，不仅从政治上引导群众，去为自己根本的最大的利益而斗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群众；不仅从物質生活上关心群众，而且从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地关心群众。解放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使广大群众日益看到个人的和眼前的利益依存于集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个人的幸福依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共产主义觉悟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更自觉地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以更高的热忱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人民群众的这种高度的劳动热忱，难道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政治思想教育和物質鼓励相結合的結果嗎？

